

#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及其方法论意蕴\*

——基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考察视角

包炜杰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及其规律为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纵向来看，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为路径的发展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强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的历史阶段。横向来看，不同于西方发展观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根本归属在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百余年演进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对于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发展观 唯物史观 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展开。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观点、理念和理论，包括发展的内涵、目的、主体、道路、宗旨等，从而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新时代新征程，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和方法论意蕴进行总结研究，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百年演进的基本阶段

建党百余年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也经历了历时性演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ZD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委托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2023WZH002）、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进。这一演进的考察维度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纵向维度上总体按照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阶段而不断展开，二是横向维度上清晰地呈现出“时代主题－基本路径－历史影响”的“三位一体”发展观图谱。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为路径的发展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与之对应的，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实际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集中回答了一个命题，即“要发展”。这是由当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sup>①</sup>。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一阶段奉行的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sup>②</sup>。在这一阶段，作为整体层面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并未实质展开。在明确了“要发展”的基础上，这一阶段发展观的历史叙事重点便集中在实现发展的前提，亦即要通过革命扫除工业发展的障碍<sup>③</sup>。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sup>④</sup>。这深刻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在于“革命”以及发展目的在于“再造国家”，而对于这一时期发展观的全部把握和理解，需要进一步深入到“革命”的背景、对象和内容中去考察。就时代主题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叙事直接表现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社会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抗御外侮、民族独立是时代主题。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将革命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先后就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翻三座大山”等路线和策略，从而锻造成为一个革命性政党。1949年毛泽东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sup>⑤</sup>。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观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sup>⑥</sup>，1949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在于领导全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③ 参见李猛：《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百年演进与伟大飞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真正意义上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这一阶段的发展观集中表现在致力于通过“四个现代化”“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亦即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观。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sup>①</sup>。从时代主题来看，在国际上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已经展开全面的冷战对峙，从而深刻影响我国国内政治动向，“一边倒”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国内则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改变。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sup>②</sup>。面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事实，中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与“赶超”二字发生密切关联，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有着明确指向，即指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化经营管理机制集中动员资源进行资本投入、技术模仿、产业革命的发展路径，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体系、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赶超英美”等词汇就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对于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问题，毛泽东先后酝酿并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原创性地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同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实现国家赶超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命题。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与之对应的，这一阶段坚持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sup>③</sup>，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时代主题来看，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共识，这一时期的发展观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展开，在理论形态上先后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再次作出判断：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sup>②</sup>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①</sup>。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我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相适应，进行了许多富有原创性的改革举措，包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特命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近10%，被外界誉为“中国奇迹”，并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学界先后就“中国奇迹”提出“人口红利说”“资源禀赋说”“竞争锦标赛说”等阐释性观点，这些观点都可以整合到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的框架下，即调动一切资源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做大蛋糕。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强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以“强起来”为目标的发展观日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得以集中呈现。值得注意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观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尤其表现在方法论和目的论等原则和内容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尤其是新时代前后发展观变化的深层次理解，应当更进一步结合新时代语境来切入。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作出调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②</sup>，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的理解突破了单一维度的物质或文化层次，转而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寻求系统化、体系化的新解，如果说我们党在第一个层次旗帜鲜明地紧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伴随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我们党更加注重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从改革的方法论特征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论”“黑猫白猫论”的渐进主义方法论逐渐转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而这背后的原因显然与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等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轴线中，发展观的理论形态、矛盾焦点、方法论特征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把握住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内容。当代中国发展命题均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在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变迁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调试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性质

<sup>①</sup>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和水平相适应,更重要的是,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现代国家的有效建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sup>①</sup>。

## 二、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中西发展观的本质差异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其发展语境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存在明显异质性。无论是纵向线索上的历史演进过程,还是横向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目的,中西发展观都表现出结构性差异,而这一比较将有助于从更深刻的角度把握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百年演进的核心命题,更有助于理解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兼具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sup>②</sup>,并且在比较中进一步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制度迷思。

### (一) 资本中心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深层次矛盾

总的来说,基于发展目标设定的差异性,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展观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路径。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以改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电气的使用为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发展”一词开始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绎,个人的“发展”就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追求收益最大化,国家的“发展”就是财富的增长。20世纪上半叶,人类国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从两极对峙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到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千年,发展观也在不断地更迭变迁。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工业文明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在初级阶段表现为资源依赖型和能源消耗型,因而该阶段的发展主要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这种发展观把发展与增长等同起来,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结果造成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第二阶段是综合发展观。这一阶段的发展观不再把“发展”简单地与经济增长画等号,开始注重追求发展的平衡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提出资源环境承受人类社会发限度的隐忧。联合国在制定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1971年—1980年)时主张关注提供更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sup>②</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多的机会，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及财富分配，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制度结构的变革。这一阶段的综合发展观表明，发展是包含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的综合发展观。第三阶段是可持续发展观。1980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在西方发展观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同样尝试抓取其中关键问题，因为发展一词并非中国独有，那么，西方语境下的发展观的变迁究竟何在。此时，我们应当将视线转移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本身，在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G-W-G'”这一“资本总公式”中，不难发现资本基于效用原则天然具有增殖目的。在资本主导下的发展观不可避免地陷入以下困境：公平性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在公平性方面，消除贫困，并不意味着消除两极分化，并不会天然地过渡到“共同富裕”的状态，相反，在西方发展的语境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突出地表现为社会财富的非正常聚积和社会收入的非正常分配；在可持续性方面，生态环境对于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承受力日趋饱和，资本投资拉动的市场需求日渐低迷，因此，必须对西方国家资本主导下的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构，这也恰恰构成了对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契机。

## （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价值底蕴与基本思想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的探索经过了历时性的主题变迁，但是从精神实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而这一价值底蕴与西方发展观背后的资本中心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更进一步地呈现出我们党价值追求的整体样态。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场语境来看，“人民”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高频词汇，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谈到“人民”就达到177次，“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命题就被凸显出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sup>①</sup>。这一提法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更进一步来看，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内含以下基本思想：一是在发展目的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二是在发展动力上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三是在发展效果上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而言：其一，发展目的论是国际比较的重要尺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具有天然的道义性。西方国家在过去百年时间中同样经历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形态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演变更迭，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增殖，是为资本家这类“少数人”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遵循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sup>①</sup>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

言》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定性，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①</sup>。其二，发展动力论是当今世界历史观分野的重要参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由此区分出来不同类型的历史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或是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这是中西方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两种迥然相异的回答。在中国共产党这里，敢于发动群众、善于发动群众是其革命斗争、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法宝。其三，发展成效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价值归宿。中国的发展是逐步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以全体人民的获得感为衡量标准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资本主导下的发展观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过程中，通过不断调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组矛盾的内在张力，努力寻求资本与劳动这对范畴的平衡，并且通过国家自主性驾驭资本逻辑，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强化反垄断。

### （三）“政党—国家—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在国家治理形态上的深刻表现

在厘清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基础上，亦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在国家治理形态上的表现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就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而言，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变迁，然而，仅用“发展”一词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差异性。在对“发展”一词“去遮蔽”以及中西政党发展观深入比较的过程中，不难得出以下观点，“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本源<sup>②</sup>，这一发展观在国家治理形态上已经呈现出“政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有机互动的结构性特征。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来看，人作为物质生产的直接从事者，作为单独个体的人是个体性存在，但是人却无法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人民则是其集合性存在。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及其治理是否回应人民需要、是否坚持人民主体、是否促进社会发展，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本质区别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政治，一方面破除了对于西式民主选票政治的制度崇拜，避免了社会撕裂、族群冲突，另一方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价值基础，再次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主导者的合法性。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③</sup>。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价值理念贯穿其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④</sup>，好的制度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一种制度的好与坏关键在于它的有效性。实践已经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② 参见王韶兴：《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政党－国家－人民”的同心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建立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不仅具有道义性更具有效性。

###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历史演进的方法论意蕴

发展观既是一个现实命题又是一个理论命题，在纵向分层和横向比较中已经基本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命题的探索概况。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提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sup>①</sup>。在对发展观命题的全部审视中，探究其历史演进的方法论意蕴则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角下对该命题的应有阐释，并由此构成了第三个维度，即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百年演进的方法论维度。

#### （一）坚持矛盾分析法，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发展命题

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观点直接点明了发展观历史演进的主要方法论依据，对此可以更进一步加以考察。在一般原理层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和总特征，其中涉及的矛盾分析法更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最直接体现，而置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语境下，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坚持矛盾分析法，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发展命题。

所谓“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的化解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如何在与现代化同义的发展中解决这一矛盾却真正考验着一个执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观层面上提炼出来的“革命”“四个现代化”“富起来”与“强起来”等话语切中的都是中国社会矛盾，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中国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从而实现根本性变革以期“再造中国”。所谓“变”，就是发展观立足于时代主题和中心任务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面对百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局势，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审时度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依据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研判时代主题，以本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切工作的“问题意识”，从而实现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其中一个具体的文本表现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到新发展阶段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性变迁。所谓“不变”，就是一以贯之的实质内核没有变化。对此，发展观至少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反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情怀始终没有变，二是蕴含其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始终没有变，三是致力于“办好自己的事情”的“认真”二字始终没有变。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正因为如此，尽管过去百年间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风华正茂”。

### （二）坚持实践原则，遵循认识的能动反映原理，推动发展观的不断演进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观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1845年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时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①</sup>近代以来，若干种“主义”“学说”“理念”先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尽管这些思想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论证为具有正确性和适用性，但是最终在中国成功实践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实践”二字，特别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②</sup>，在发展观问题上同样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与此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在发展观的更迭变迁中，“革命”“四个现代化”“富起来”“强起来”都可以视作实践的形式或目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衡量尺度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提高发展水平推进发展阶段，并以发展实践推动认识更新，由此在发展观层面构成其历史演进的独特标识。

在今天，“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sup>③</sup>，这样一个新的实践样态必然产生发展观的更新认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这意味着中国在复兴征程中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发展观的更新则突出表现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例，正是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新背景下制定的，这是符合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趋势和大国经济成长规律的、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并通过实践而不断检验和演进的。

### （三）坚持唯物史观，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至上基本原理

“发展为了谁”是区别资本主义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一把“密钥”，基于这一角度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难分析出资本中心论与人民中心论的两种发展观。如果更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何以坚持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那么势必会从作为方法论原则的唯物史观那里得窥一二，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作为发展观定位的方法论依据，并且以“大写的人”贯穿其百年历史始终，昭示了新时代人民至上基本原理。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历史动力问题，深刻指出了社会主义在道义性和科学性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性，强调了人民逻辑与资本逻辑在不同社会发展中的整体差异性，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宝贵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纵观百余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恰恰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不断建构其自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运用这一方法论实现高质量发展呢？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性这一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离不开现实前提与有力支持。因此，社会主义发展观在遵循规律基础上应当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展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比较优势。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产体系边界的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发展观应当立足于此，既要吸收借鉴先发经验又要鼓励原始创新，从而积累和发挥后发优势，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要义；另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基本原理，推动发展成果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共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①</sup>，中国共产党时隔多年再提“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观”，充分表明在以往发展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党有信心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发展观命题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多维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展开叙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发展中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从而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视角。

（包炜杰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文志]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